

THE BUND  
外滩画报



钢琴男神李云迪

# 万物皆与音乐有关

钢琴之外，李云迪对美食、红酒和汽车的爱好早已不是秘密。  
无论聊什么，他最终会将所有事物和音乐联系起来。

专访英国纪实摄影师科林·麦克弗森  
苏格兰，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摄影：覃斯波

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总第609期

统一刊号：CN31-0068

新闻热线：021-62484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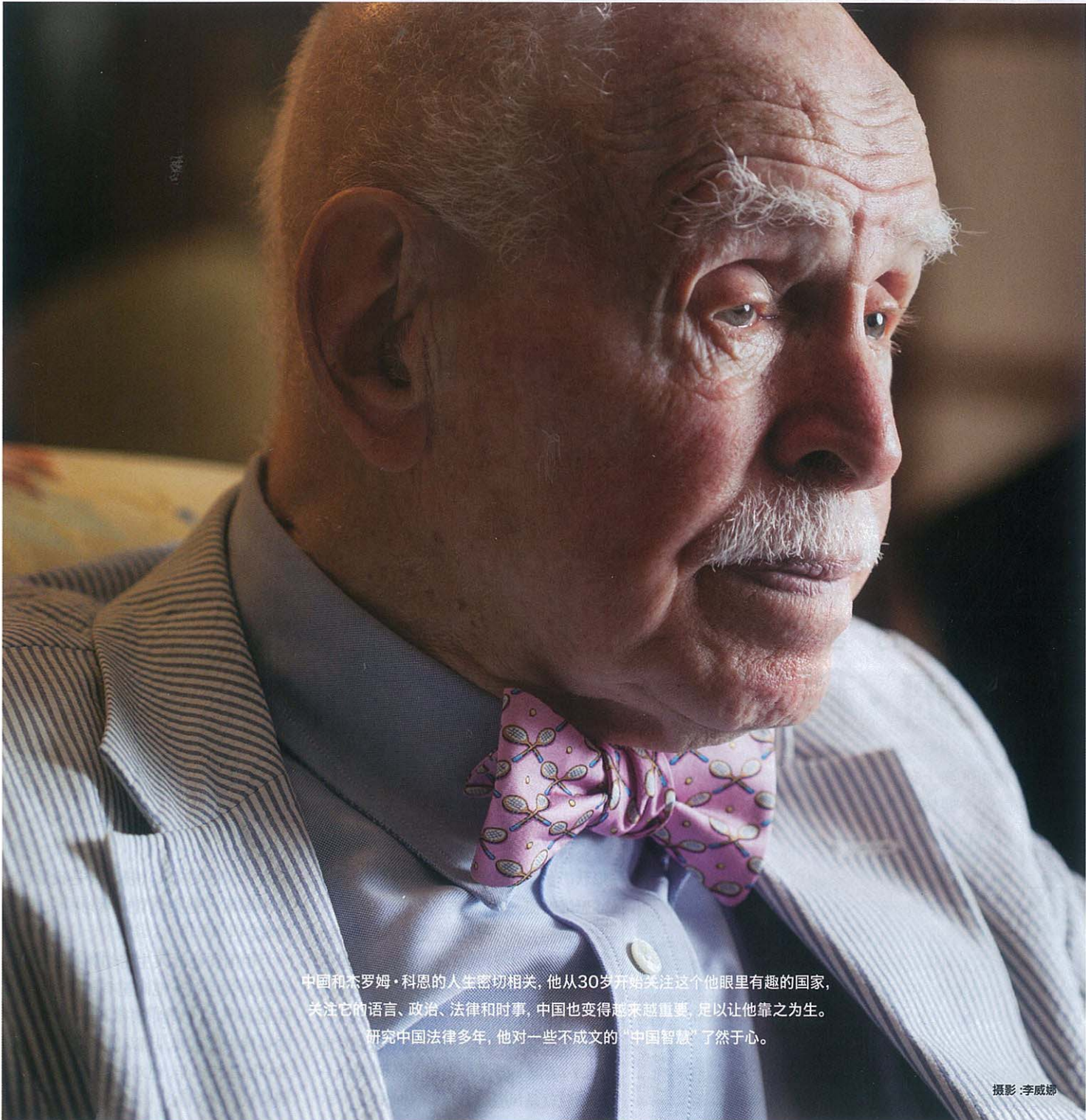
Email: bund@bundpic.com

每周四出版



#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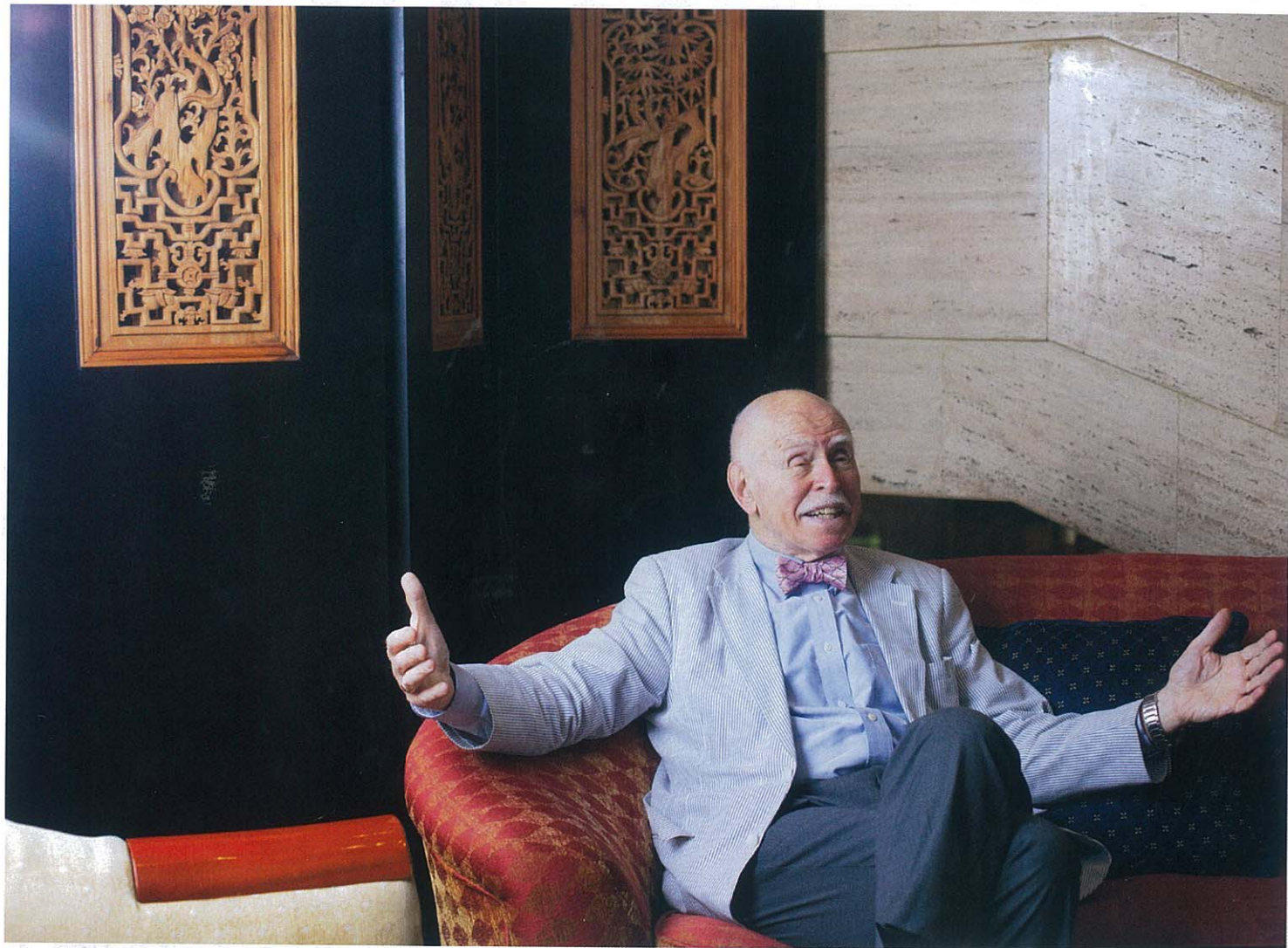
- 杰罗姆·科恩: 红色中国历险记 P63    ○ 莫西子诗: 要保持初心, 要发现事物的美 P68    ○ 如果想要了解我, 只要研究一下“小康”就够了 P72  
○ 让故事自己说话 P76    ○ 张国立: 书房就是自己 P78



中国和杰罗姆·科恩的人生密切相关, 他从30岁开始关注这个他眼里有趣的国家, 关注它的语言、政治、法律和时事, 中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足以让他靠之为生。研究中国法律多年, 他对一些不成文的“中国智慧”了然于心。

摄影: 李威娜





## 中美法律界的“基辛格”

# 杰罗姆·科恩：红色中国“历险记”

文：华琪 摄影：李威娜 编辑：鲁毅

杰罗姆·科恩的身上有太多标签：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宝微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英九的老师，中美关系破冰的重要见证人……就像一棵枝叶丰茂的树，随意摘一枝插瓶就是风景。

**杰** 罗姆·科恩 (Jerome A. Cohen) 在上海静安寺的希尔顿酒店大堂左右张望。希尔顿和喜来登一样，是他在上海最爱的酒店。他早年做过律师，在他的努力下，喜来登集团在1980年代中期开出了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

他像位旧时代的绅士，穿着妥帖，礼貌，花白的胡子和眉毛被他梳理成合意的

杰罗姆·科恩在上海静安寺的希尔顿酒店大堂接受采访。希尔顿和喜来登一样，是他在上海最爱的酒店。他早年做过律师，在他的努力下，喜来登集团在1980年代中期开出了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 (摄影：李威娜)

形状。他今年84岁，行动虽有些踟蹰，依然思维敏捷，爱开玩笑。

我们在酒店大堂里支着灯，边聊边拍照。和他聊天，常常不知从何聊起。他的身上有太多标签：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宝微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英九的老师，中美关系破冰的重要见证人……就像一棵枝叶丰茂的树，随意摘一枝插瓶就是风景。

“‘灵活安排’、‘慢慢来’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话。”他突然冒出两句中文，咧开嘴笑。

中国和他的人生密切相关，他从30岁开始关注这个他眼里有趣的国家，关注它的语言、政治、法律和时事，中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足以让他靠之为生。研究中国法律多年，他对一些不成文的“中国智慧”了然于心。



## 法律界的“基辛格”

科恩有一个中文名叫“孔杰荣”。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我到北京的时候，他们看到我的名片，说不行，我们‘批林批孔’。你不能姓孔。”直到很久以后，他才被允许在大陆重新使用这个名字。

杰罗姆·科恩1930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一个地方政府检察官的家庭，从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曾在华盛顿给两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做助手，1959年，他顺利地到加州伯克利法学院谋到一份教职。“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是当老师了，当然当老师在美国很有地位，永远不会失业，还很自由。”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找到了他，希望他找一位能接受四年赞助，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一直没有适合的候选人出现，于是我决定毛遂自荐。”他说。

那时正是殖民地国家争先恐后独立的时候，学界的热点是非洲。“研究一个根本去不了的国家的法律，同事都觉得我疯了，一定是精神有问题。”他大笑。“那年我三十岁。你们中国人喜欢说，三十而立。我就是在三十岁那年找到了我一生要做的事情。”他说。“说起来也很巧，我出生在1930年7月1日，和你们的党同一天生日，不过党年纪更大一些。”

在他不能访问中国的13年间，他学会了说流利的中文，去香港访问了许多从大陆迁居过来的专家，请教一些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问题。根据这些访问，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1943-1963》。

1960年代初，美国白宫易主，新总统肯尼迪继续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气氛很不友好。整个196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漩涡，各地反战游行一波接一波。

1964年似乎是个重要的年份。1964年1月，在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后的四个月，迪伦发行了新专辑《时代在变》，“……现在的失败者/会成为以后的赢家/因为时代在变。”这张专辑封面上，迪伦眉头微蹙的愤怒面孔，成了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表情。

同一年，遥远的中国引爆了一颗原

子弹。“当你要引起某人注意时，引爆一颗原子弹是个好主意。”他开玩笑。那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忙着和中国建交。

就在这一年，科恩被聘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并在那里前后待了17年。他创立了学校的东亚法律研究会。自此之后，他不时主张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终于等到了一位愿意采纳他建议的总统。1969年1月，尼克松就职成为美国总统。在选举前一年，《外交》杂志曾引述他的话称：“这个小小的星球上还不足以容纳10亿可能最有能力的人生活在愤怒和与世隔绝之中。”

“我其实一直对国际关系很感兴趣。我上高中的时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我和基辛格走了不同的道路，他在大学毕业后选择成为一个国际关系博士，而我去了法学院。许多人告诉我，如果要让职业生涯有更多的机动性，不要依赖政府，不要依赖时局，学法律可以做律师，也可以做和国际关系相关的事情。”他对本报记者说。

基辛格，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成了中国通。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Frank K.Upham在科恩80岁生日的祝辞里说：

“他用另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影响着中美关系。他带领着一群美国学者秘密建议尼克松政府在1960年代后期和中国政府重建关系，在这之后才有基辛格1971年的秘密访问。”

在尼克松访华后四个月，科恩和两位美国科学家及数学家一起访问了红色中国，他们是第一批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第一次访华时，科恩就见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

“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请我们一起吃晚饭，并像这样讨论了四个小时，主要讨论中国和美国之间如何合作。”提起那次夜宴，科恩仍然能清晰地描摹出许多细节。

“我和一位哈佛同事，历史学家费正清坐在周恩来两边。费说服他送学生去哈佛，最终他们同意了。”他说，“我最爱的中国的一句话是‘需要一个过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他很聪明，喜欢开门见山。他总是不停地问问题，先抛出一个问题，看

我们怎么接，然后再抛出另外一个。”他说，“他的思维很快。在开席之前他问我们，能不能帮我们推荐几个最好的美国治疗癌症的医生，我以为他是为毛泽东问的，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得了癌症。”

“他很有幽默感。周对我说，我知道你们写了不少关于中国法律体系的书籍。说着戳了戳我的大腿，狡黠地笑了下。他的助手也在旁边笑。1970年代，因为‘文革’，中国的法律体系几乎崩溃，所以他在想，怎么会有人能写出一本关于中国法律的书籍。”他大笑。“他真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晚宴主持人。”

那次晚宴上，科恩建议周恩来，中国政府应提名法官进入国际法院。“当时，周和席上其他中国官员哄堂大笑。他们把我当杰克·本尼（美国著名广播电视喜剧演员）了。共产主义中国怎么会想派代表到一个资本主义法官占绝对投票优势的法庭去呢？”他回忆道。

1984年，中国做了和当年科恩建议完全相同的事，向国际法院提名了一位法官。

“现在所有国际组织都有来自中国的优秀法律人才。”

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后四个月，科恩和两位美国科学家及数学家一起访问了红色中国，他们是第一批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第一次访华时，科恩就见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

在科恩所有的身份里，最重要的是“老师”。一位精通中国法律的美国教授，为中国法制培养了许多法律人才。





## 红色中国的历险

在1977年，他陪同美国参议院Ted Kennedy又一次访问北京，见到了邓小平。嗅觉敏锐的他认定改革会给中国带来巨量外国投资，这里面充满着机会。于是，1979年，在他得知一个能来中国居住的机会之后，毅然放下哈佛的工作，满怀好奇地在红色中国开始了商业冒险。

那还是个外国人在中国无法走动的年代。要么住在友谊饭店，要么住在北京饭店。他选择了离市中心更近的北京饭店。

那时中国有许多他无法理解的事情。“没有透明度。”他突然一个字一个字吐出一句中文。“和服务员接触是很崩溃的。服务员是个神秘的系统，他们是安保的一部分，总想刺探我们在谈什么，跟踪我们。”他们与普通人只有很少的接触。不能去中国人去的餐馆，去电影院普通售票窗口是买不到电影票的。“他们会对我说，你要去找你的单位，才能买到票。”

“那时候北京没什么办公楼，我就在北京饭店里开设了第一家美国律所。我住在一个房间，公司开在另一层楼的一个房间。”他回忆。那时根本招不到合适的人。以前中国许多律师，都被打成了右派。律所体系也沿用了苏联式的法律顾问处。律所的第一位员工，是他一个中文很好的学生。

北京饭店是他工作、生活、娱乐的中心。“所有的外国人都会去那里，如果你张开眼睛观察，你会发现许多故事，谁和谁吃了饭，谁和谁在做生意，谁和谁上了床。有意思极了。”他一边说一边比划，像是叙述一部电影脚本。

“有时候，我会在周四早晨醒来，突然意识到，好像周日过后就再没出过饭店门。”

科恩的妻子乔恩 (Joan) 是位艺术家，常常去大学里演讲。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吃好晚饭去中央美术学院接在那做讲座的妻子，那是1979年的2月，中美

**在李红眼里，科恩是位很有正能量的老师，他很爱提问，也很有怀疑精神，这是满足他好奇心的一种方式。**



科恩和妻子乔恩1979年在沈阳。乔恩是位艺术家，常常去大学里演讲。因为和艺术家的关系，他们获得了许多在中国境内旅行的机会  
(photo by joan lebold cohen©)

刚刚建交，邓小平访美归来。这是30年以来，艺术家们第一次有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被那个场景打动了，上千人座无虚席，聚精会神听一位美国人谈当代艺术，窗户上凝结着水汽。结束后，乔恩被艺术家们团团围住，他们仍对很多问题好奇。“在北京两年半，这是最难忘的时刻。”科恩说。因为和艺术家的关系，他们获得了许多在中国境内旅行的机会。

当初他孤注一掷研究中国法律，终于开始进入收获时节。他的律所帮助许多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从石油公司，制药公司，汽车公司到酒店，IBM，喜来登，GE等都是他的客户。

1967年，他还在哈佛教书的时候，他被邀请去密歇根大学做一个关于中

国法律体系的介绍。他原本打算周末和孩子们一起去玩。妻子说，去密歇根浪费什么时间，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法律体系啊，但他仍然去了。“12年后，当年听众里一位学生给我打电话，他在为通用 (GM) 做法律顾问，公司打算在中国成立一个10亿美元的合资公司，而他根本不知从何下手。”

中国政府希望他为中国的干部讲法律课。“招不到好的翻译，我只能自己拼命学习中文来适应这个环境。这让我的中文突飞猛进。”1979年2月，他在中国税务局待了一周，帮助他们为中国制定税法。当年夏天，在大连海边的一个酒店，每天8小时，每周6天，持续整整四周，他为125个各级官员讲解税法。



从上至下

1. 科恩和妻子乔恩 1979年夏天在大连海边

2-5. 乔恩拍摄的当时的中国

(1-5. photo by joan lebold cohen©)

6. 科恩和马英九在一起。在台湾, 马英九、吕秀莲都是他的学生

成了她所在律所最大的竞争对手。”

“1988年,我帮助一个中央机关的年轻人去哥伦比亚大学学法律。过了很久之后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西雅图的一家律所所有实习机会,他会实习一个月后再回中国。”科恩说。很多年后,他在北京国际机场等飞机。随手拿了份华尔街日报,头版新闻是星巴克进中国。他突然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仔细一看正是那个当年的年轻人。“他成了大资本家了。”科恩大笑,又说起了中文。“我原本希望他成为中央机关的法律顾问,结果他成了星巴克总裁。”

大部分学生都仍然和他保持着联系。在台湾,马英九、吕秀莲都是他的学生。因为他们政治观点不同,李红说,科恩现在去台湾,常常要分别去和他们见面。在科恩眼里,他们都是学生,吕秀莲因“美丽岛事件”入狱后,科恩还曾在马英九的安排下去探望狱中的吕秀莲,马英九当时是蒋经国贴身翻译及国民党副秘书长,最后科恩说服马协助释放吕秀莲出狱。

2001年,李红去纽约大学学习法律。很久以前她和柯恩就有交集。她曾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工作,科恩在此担任仲裁员,是当时少有的在中国担任仲裁员的外国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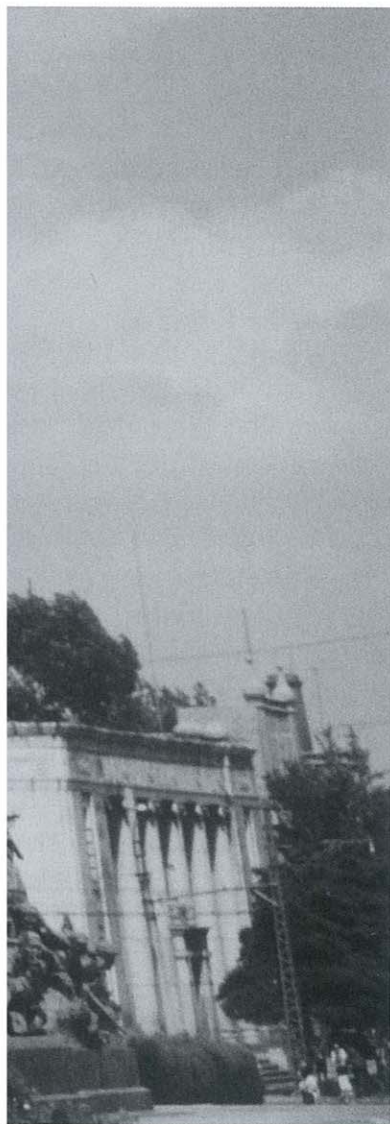
“他很有批评精神,有一次在课上讲仲裁,他提出了许多中国制度和设计上的意见,我曾在CIETAC工作过,几乎当时就站起来反驳他。气氛很激烈,我几乎以为要得罪他了。但没有,他笑眯眯地说这就是他想要的。”李红回忆道。在她眼里,科恩是位很有正能量的老师,他很爱提问,也很有怀疑精神,这是满足他好奇心的一种方式。

他也很幽默,每次上课前都会说两句名言俗语。“上课的时候有学生迟到,他会说‘迟到总比不到好(It's better late than never)’,我的方向感很差,他会建议我‘跟着你的直觉走,然后选一条相反的路线’。”李红说。

在李红学习期满想回国的时候,和他深谈了5个小时,他建议她“跟着自己的心走,做想做的事情”。

“他做过首任大法官助理,仲裁员,当过美国最有影响的律所合伙人,参与过法律制定,涉足过国际关系,也了解中国。”李红说,“他几乎是我们能找到的法律经验最丰富的导师。”

“做他的学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 科恩和他的中国学生们

在他所有的身份里,最重要的是“老师”。一位精通中国法律的美国教授,为中国法制培养了许多法律人才。中伦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李红是2001年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任教时的学生。她对我说,“可以说,在大陆做高端涉外律师的,大多受过他的影响和帮助。”

一些学生让他印象格外深刻。

1980年代,赵嘉(音译),一位外交部的翻译,在他的帮助下进入哈佛,他甚至与她从一个波兰法律基金会找到了4万美金的奖学金。“这多亏了我的一位同事,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波兰法律和中国法律的关联然后申请到这笔钱的。”她毕业后,回国了几个月,很快去了美国芝加哥一家律所,她很努力,变得非常成功,最终